

第一章 人物评价的必然性

人类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人物个体有什么作为，有哪些功过，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后人和同代人对他们进行评价是十分自然的。可以说，评价人物，尤其是杰出人物的功与过，是人类社会尤其是进入有文字的历史以来，古今中外所不可缺少的一项历史活动。它既反映了人类思维的认识本能，也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历史主动性。

一、评价人物的古与今

认识和评价人物，并不是始自今日，也不只是限于中国，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尤其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的一种共生的认识活动。因为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要谋生，要分工，要管理，要交往，要追求，要思考，就会有对人的认识和评价。

这种评价，最初形态应该始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本能。人类要发展，首先就要繁殖，就要找对象。择偶标准尽管各种各样，而且有一个发展水平问题，但不管是原始人还是现代人，总是有所选择的。选择就是对对方的评价，至少有美不美、好不好两个评判标准。美不美，讲的是外在条件，好不好讲的是内在条件。不讲任何条件的择偶（相对而言）是不存在的，因为连动物

都要通过竞争才能“上岗”，何况具有思维的人类呢？再如，选什么样的伴，交什么样的友，拥戴什么样的人，都有一个评价的问题。荀子讲“游必择士”，孔子讲“里仁为美”，孟母有三迁，讲的都是对朋友、对邻居的选择。人们为什么拥戴尧舜禹，就是因为他们为人民做了很多的好事，如大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多么感动人！这就是因评价而作出的选择。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人们的评价活动逐步由自发评价到自觉评价，由口头议论到文字记载，由与个人直接相关利益（如择偶、择友等）的评价到与自己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相关的评价（如对帝王将相等政治人物等），由零散评价到系统评价。到今天，人物的评价活动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重要认识活动了。

以中国为例，这种文字评价始于简单汇编言论文诰成册的《尚书》。之后就是按年月顺序排比史实的《左传》。《左传》善于描写历史人物，对许多正反面人物都有深刻的刻画和精当的评价。写春秋五霸人物，各具特色。书中讲的虽然是他们争霸、称霸的过程，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他们的评价。如对晋为什么立悼公作了一番这样的评价：“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己责，逮鰥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①对晋悼公的这番评价，道出了他的为政为人，赞颂之意溢于言表。如对秦穆公这个人物，《左传》也用了不少笔墨，通过他对许多事情

^① 《左传》第 155 - 156 页。

的处理，说明他是一个贪婪、虚伪、反复无常、利令智昏的人，同时也认为他是一个能悔过自责，承担失败责任的人。对宋襄公的迂腐可笑，书中也作了集中的描绘和评价。

孔子的《论语》，虽与《尚书》一样是言论汇编，但在这些精辟的言语之中也包含着对人物的评价。如评价泰伯时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评价樊迟是“小人哉，樊须也”，而子产“惠人也”。还在多处评价管仲，认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到了汉代，出现了三大史家，一是司马谈和司马迁，二是刘向和刘歆，三是班彪和班固。三氏各创一体，成就斐然。如果从人物评价这一角度论，司马氏父子成就最大，次为班氏父子。“史之体例 迁实创之”。^①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它上起五帝，下迄汉武，《史记》共 130 卷，其中列传 70 篇、世家 30 篇、本纪 12 篇，占了 112 卷，这 112 卷，都是为历史人物立传的，展现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

自《史记》诞生之后，这种编纂体例就基本定向定位，每一朝代都有，有的全部是本纪和列传。如《三国志》、《南史》、《北史》等，未发生大的变化。袁枢的纪事本末体，是编年体或纪传体本纪部分的变化形态，班固的断代史（汉书）也只是《史记》的“具体而微”的一个横断面，杜佑、马端临的专史同样是《史记》“得其一端”的形式。纵观中国“二十五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武昌起义赶走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五千余年间，其中的纪传体内容都占相当比重。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当时的史实。“纪”为帝王本纪，列在全书之前，“传”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丛》。

为其他人物列传。

当然，从总体上讲，这种纪传体把观察、评价的视角主要放在帝王将相身上，对中下层人物则很少论及，要写，也只是有一些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贞女、烈妇、孝子。而且，这些评价对尊者贤者基本上都取隐讳态度，只歌功颂德，缺乏全面性。但有三点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它毕竟写了人，重视人，体现了人创造历史的活动。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① 人的历史为人所造，这本是常识，但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古代，神创造人类历史的认识比较普遍，尤其在西方古史家那里，他们笔下的历史都是神迹的记录，人在史书中只是神的附属品，只有在宗教史的字缝中才可依稀看到人的活动。我国的二十五史及其他一些史书，却始终围绕人物这一主线进行编纂，以远古重要人物黄帝开其端，以众多清官廉吏、功臣学子、孝子节妇、“盗贼”、“奸凶”结其终，阅尽人间众生相。尽管有的史书也有较浓的宗教色彩，如《南史》等，但人一直是主线。这些都是西方的“神迹”史学所不可比拟的。

第二，它毕竟写出了许多代表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笔下，许多杰出人物跃然纸上，展现眼前，令世代炎黄子孙叹服、骄傲！令中华民族永远鲜活、自豪！例如，（通鉴）在评价刘邦何以得天下时，记述了刘邦自己一段很精彩的表白：“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57 页。

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这样一段很简单的话，既道出了汉兴楚亡的一条重要原因，又树立了刘邦雄才大略的高大形象，还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样的记载和评价在史学家笔下数以万计，为后人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大量的宝贵史实和珍贵见解。

第三，它毕竟反映了史家的许多有益评价观点。在浩如烟海的纪传体及其他史书中，要想系统地理出历代史家评价人物的思想和观点，非一日之功，也非吾辈之能，但可举出一些有代表性人物的主要观点。如南朝齐末的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虽是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著，但由于文史不分家，也反映了他在记载和评价人物上的一些观点：为了达到表彰善行，谴责邪恶，应当“立义选言”，而选择的标准是“必附圣以居宗”；应该为尊者贤者隐讳；应该效仿南史氏、董狐的秉笔直书；不主张为皇后立纪。唐代史家刘知几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专著《史通》，他的观点与刘勰基本相同，但也有区别。如认为：“史之为用，记功司过，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所不同的是，他不主张选事而书，而认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主张客观地记载史实；也认为应为尊者贤者隐讳，并对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述其父祖不肖”的做法深恶痛绝，但不主张“爱憎由己”；不仅反对曲笔，而且在《史通》上专辟《直书》、《曲笔》专篇论述史德，认为人贵正直，史贵直书；对司马迁、班固把吕后、高后列入本纪持赞成态度。而南宋的吕祖谦，在人物纪传方面，主张“无所褒贬抑扬”的实录精神。这种忠实的“载其实”原则，具体表现在不主正闰、不主一字褒贬的叙事态度上。他对秦始皇的暴政本是切齿痛恨的，但在记述有关秦代史实时，却忠实引用原文，不加贬词。他认为如要褒贬，可在史论

中发挥。如此等等，弥足珍贵。

除了“二十五史”，还有其他许多著作如《资治通鉴》等都包含有丰富的人物评价及其思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物志》。（人物志）由三国时期的刘劭所撰，实际上它是一部“政治人物论”，是专门论述政治领袖、政治人才的。其中的《英雄》篇，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的“首脑论”。它采用要素组合法和人物分层法对人物进行评价，认为，在要素组合上，英雄所包含的要素最全；在层次区分上，英雄的政治地位最高。政治人物在智力才能上包含了“英”和“雄”两个要素，“英”是“聪明秀出”，包含“聪”和“明”两个次要要素；“雄”是“胆力过人”，包含“力”和“勇”两个次要要素。然后就根据这两大要素包含有的几种次要要素的排列组合，区分出了两个系列三个层次六种人才。但他认为这些都是偏才，即使是“英”和“雄”也只能做人臣，“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刘劭以张良、韩信为例，说张良属“英”，韩信属“雄”，只有一身具备了英与雄两类人才特点的人，才可称为英雄。他以刘邦和项羽为例，认为二人同是英雄，但又不等同，前者“英”多于“雄”，后者“雄”多于“英”，刘邦强于项羽之处就在于此。他还提出一条规律：“徒英而不雄则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刘劭虽然是着重从理论上综合地论述政治人物特点的，但却通过对许多人物的评价，为我们后人提供了许多可供人物评价的思路和观点。一个古代人，能作出如此精彩的分析，完全反映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难能可贵的思维档次。

近代以来，中国在人物评价方面似乎处于一个低潮，所留下可供赞叹的除梁启超等少数有成就者外，其他所见不多。究其原

因，恐怕至少有两个：

一是长期处于外患内乱的境地，无暇顾及这方面的研究。回顾历史，史学繁荣之际，必定是国泰民安之时。你看，刘邦夺取天下之后，呈现何等气魄恢宏、英才辈出的景象：帝有高祖汉武，将有韩信、英布，臣有张良、肖何，外有张骞、李广，内有杨雄、董仲舒，正是文韬武略，安邦治国，好不昌盛！正是这种社会态势，注定了文化的发达、史学的繁荣，200年内竟出现史学三大家：司马谈和司马迁；刘向和刘歆；班彪和班固，世界少有！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一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水深火热中挣扎，后来又是日本侵略，国共内战，社会一直处于不稳定、不统一、不景气的状态之中，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谈何史学之繁荣！尤其是在政治权力高度发达、思想自由严格限制的旧中国，注定人物评价的冷落和避讳。所以，不少理论专门家如胡适等都远离政治而一头扎进了“国学”故纸堆里，成为又一个历史“考据癖”。聊以自慰，何管其他！

二是长期受“左”的思想的禁锢，不敢在人物研究方面有贸然之举。本来，建国后，我国的史学研究、人物评价能再创辉煌的。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本人就喜欢拨冗历史、评点人物。他毕生酷爱读史，中国所有的著名史书，包括正史、野史，他都广为博览。通过读史，他纵论天下人物，有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贾谊为梁秦汉专家，33岁因梁王坠马，自责“为傅无状”而郁郁死去，毛泽东对此深表惋惜，感叹地写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魏书·刘表传》中说：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批注说：“虚有其表。”总之，不计其数，已有众多专著和专文论及，这里不再详举。一首《沁园春·雪》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

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试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完全体现了他指点江山、激扬人物的大气和勇气！文学社会科学（包括人物研究）本可如汉代那样再创辉煌，但不幸的是，我党长期奉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方针，自觉不自觉地设置了许多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禁区。大凡人物研究，无论历史的、近代的还是现代的，都必然要涉及方方面面的评价，弄得不好就会招来横祸。武训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人物，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上学，他能那样低三下气地到处化缘、乞讨，不容易，应该作些历史的肯定。但《武训传》电影一放，马上遭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①此风一开，“帽子”、“棍子”就满天飞了，谁敢“惹是生非”？随着“左”的不断升级，更加“鸦雀无声”了。要评价，也是一边倒、一个声音，孔子也成了不齿于人类的“臭老二”了，几个“胆大妄为者”如吴晗、郭沫若等，重者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轻重被批倒批臭，难以翻身。“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待商量”，实际上也不是商量，而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史学研究、人物研究才又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不仅正面人物

^① 见毛泽东 1951 年 5 月 20 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可以深入地评价，连有争议的甚至反面人物也可以实事求是地重评了；不仅死去的人可以评价，连尚活着的人也可撇开“盖棺定论”而进行评价了。在这方面，叶永烈先生的系列人物传是个最好的注脚！当然，如果要涉及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得谨慎。从客观原因来说，由于材料的保密性、政局的稳定性和业绩的检验性，在时空上错开一段距离是必要的。当局者迷，太急了、太近了，反而看不真切。中国国情与外国国情毕竟不同。在国外，一个总统上台或下台，他的评传就立即出版了；而在中国这样做，只能弊多利少，至少在目前阶段上是如此。虽在境外出版有大量评价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书，但毕竟是局外之言，姑妄看之，不必认真，无伤大局。

以上讲的主要是就中国的人物而言，实际上，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近代西方诸国也是很重视的。英法德等国都有著名的人物传记作家。法国的莫洛亚，一生写过多种传记，有诗人的，如《雪莱传》、《拜伦传》；有哲学家的，如《伏尔泰传》；有小说家的，如《巴尔扎克传》、《乔治·桑传》。他写传记，材料确实，经得起检核。关于拿破仑的传记，自拿破仑去世至今，国外已有多种版本从各个方面进行评价。有的人物由于其地位和作用的独特性，还成为国际上共同关注的人物。如关于拿破仑的评价，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还在争论，还在深入。又如对叶卡特琳二世的评价，有的说是风流女皇，有的认为是有作为的政治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它却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人物评价是人类共同的认知活动。

二、评价人物的缘与由

一个人只要出现过，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是死人还是活人，他就有被他人当作认识客体进行评价的可能性。人能区别其他动物，就是有思维。思维，就意味着认识，意味着反思：这个社会怎么样，这个环境怎么样，这个人又怎么样。人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认识和反思呢？就社会对人物个体的认识和评价来说，主要有七大价值：

（一）认识价值

所谓认识价值，是特指对客观历史的科学认识，以便把握和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科学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来研究的，而历史事件又是由历史人物的活动构成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正是通过对人物的研究，认识历史事件，认识和掌握历史规律，以为后来者减少盲目性，提高主动性。

例如，通过对中国各代封建王朝君王沉浮的研究，就可以发现一条重要规律：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我国“文化大革命”，先是林彪“折戟沉沙”，人们扬眉吐气，后是逮捕“四人帮”，人们举国欢庆。为什么？就是他们早就人心丧尽。毛泽东刚一逝世，党中央粉碎“四人帮”能一举而成功，也在于顺应了人心。相反，他们一直想打倒周恩来而没有成功，也在于他们懂得：反周民必反！这一规律，应该为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所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8 - 119 页。

记。

再如要发展生产力，要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安定团结，这也是被历朝历代统治人物的沉浮史所证实。人民一般为什么拥护推翻旧王朝、欢迎新皇帝？就是新皇帝一上台一般推行让步政策，让人们得到休养生息。为什么称赞“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康乾之治”？就是这些皇帝实施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社会繁荣、稳定的政策。邓小平一再打倒，却一再被人民呼唤和拥护，就是他的思想和主张是搞“三个有利于”，对人民和国家有好处。凡是背道而驰的，必然犯错误、跌跤子。

又如，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可违背性。历史的发展存在特殊性，不要拿一般性来否定特殊性，这是对的；但是，即使发生了特殊性，也不能忽视和否定一般性中的基本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观察和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几个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并获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上的，即科学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上的必然产物。但付诸实践时，这种一般性却以特殊性出现，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发生。历史的进程虽然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本质性内容是不可违背的。这些国家取得了政权，正因为生产力基础落后，就应该集中精力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把这件事做好，终于导致苏联走了回头路，我国也遭受重大挫折。

（二）政治价值

大凡政治价值，主要是通过对其人的评价，达到取得或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合理性目的。具体角度又因需要而异：有的是通

过评价以达到把各种认识统一到某一需要的层面上；有的是通过评价别人以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有的是通过评价以达到抚慰亲友、安稳人心和政局的目的。

由于毛泽东一生特殊的历史活动，尤其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件，于是在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开始对毛泽东议论纷纷了。在这些议论中，有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是三种：第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一生有功有过，但是就整个来说，还是功大于过；第二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一贯正确，无过可评，就是有过，也是神圣不可妄评，要评就是砍旗，就是赫鲁晓夫；还有第三种看法是贬多褒少，甚至取整体否定态度。当然，别有用心者还不在此列。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迫切要求我们党进行合乎实际的评说，以明辨是非，统一思想，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正确发展。如果此时拒绝对毛泽东进行正确评说，压制评说，表面上看起来可能鸦雀无声，实际上却会暗流滚滚，潜伏着极不安定的因素。事实上，那时拒绝对毛泽东进行正确评说，就等于自毁政权，自毁大好机遇。如果那时不及时打破个人迷信，开始对毛泽东的活动和思想运用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标准进行评说，那么，“两个凡是”的观点能动摇吗？这个拦路虎不打倒，我们后来能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吗？显然不能。那么，就等于只能继续维持过去那种“左”倾错误局面，就只能加剧思想混乱，就只能使我们的光明前途有可能在一片新的个人迷信中葬送。党中央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顺应历史潮流，集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智慧，经过上上下下、党内党外、反反复复达十次之多，经一年零三个月之久，终于写出了一部历史性文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公正的评价，既高举了旗子，又破除了“凡是”，为澄清混乱、解放思想、拨乱

反正、开创新局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评法批儒”，也是一种含有政治意图的评价。它把历史上的许多人物分成儒法两家，凡儒家就是保守派、传统派，凡法学就是革命派、改革派，任意拔高法家，大肆宣传法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及其“左派”们的做法，以打倒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一批反对者。后来又评水浒，说宋江是投降派，架空晁盖，也是为了影射周恩来等人。这也是一种对人物的评价，但是出于政治需要的一种影射评价。由于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它是无法做到公正、客观的。江青要人们研究武则天、吕后，也是为自己当女皇而寻找合理依据的。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自发、散见的对某一上级官员的民间议论（如顺口溜等）也是具有政治价值的评价，它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应当引起重视。自古以来，不少统治者都把顺口溜作为“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资政参考。春秋时就有“采诗”制度，专门派人收集“代语、童谣、歌戏”报官。《汉书·食货志》载：“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有的朝代顺口溜多了，“天子”还要下“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可见顺口溜等民间议论具有匡时警世作用。“四人帮”垮台前夕，“小道消息”盛行，他们不因此而收敛、甚至改弦更张，还利用手中权力当作“政治谣言”追查，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结果最终被全国人民所唾弃而成为阶下囚。

（三）思想价值

人类文化是通过一辈辈人继承、扬弃而积淀起来的。在这个积累过程中，就需要对今人和前人的学术、理论思想进行评价，

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一步光大、繁荣。

我国历代统治者都注重研究孔子，是为了从孔子思想中找到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思想养料和理论武器。如孔子的“三纲五常”说、仁爱说、礼治说、德治说、中庸说、修身说等，就一直成为统治者尊奉的理论依据，孔子也成为人们长期以来顶礼膜拜的先哲。他的思想经过董仲舒、朱熹等后人的诠释，已成为中华民族二千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本人也成为中华民族是文明古国的显著象征。只是到了近代，才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其意在于冲破儒家桎梏，提倡科学和民主。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及《儒教与道教》中，认为儒家学说是封闭型、轻科研，断言儒家伦理不利于工业文明的产生，又引起了一批东方学者对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新的研究。如游唤民先生所著《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岳麓书社1994年版），就批驳了马克思·韦伯的这种说法，认为孔子学说不但是包容性很大的开放型学说，而且能促进现代经济、现代精神文明、现代爱国主义的发展。是耶，非耶，姑且不去判断，但通过这种争鸣式的评价，不但使孔子思想的研究得到深化，还可开阔我们的评价视野。

历朝历代都有撰写正传、别传、评传及回忆录等形式的传统，大都是通过为前人立传而分其功过、扬其精神的。后人在不断地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其实他们生前也在不断地评价他人。如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对许多人物进行过评价，如威廉·科贝特、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罗伯斯比尔、拿破仑、林肯、波拿巴、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魏特林、布朗基、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培根、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费

尔巴哈、配第、魁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人物。正是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批判地吸收了他们在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合理思想，形成了当代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我们研究列宁，研究斯大林，研究毛泽东，研究邓小平，固然是为了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但要真高举，也必须具体研究这些人物一生的历史。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什么会在实行一年之后突然中断？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么搞起来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文化大革命”？通过正确研究，真正把正确的思想坚持下来，而对其失误和错误则要吸取教训，采取措施，不再重犯。

（四）历史价值

历史是逝川中沉淀的岛屿，它无可变革，难以复制。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历史要使我们后人的认识达到原貌，十分艰难。因为古往今来，由于所处立场、观念的不同，以及认识的差异，历史常常被自觉不自觉地整修而扭曲。所谓历史价值，就是要通过评价，使历史上的一些被歪曲或比较复杂的人物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①评价这些人物，往往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明显的目的，但却有保存历史、保存资料的本貌性、完整性的价值，而且也反映了评价主体的认识水平和客观环境状况。

1931年9月下旬，杨度病逝于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家中，丧事在沉默中进行。鼓乐不响，挽联阙如，花圈极少，除偶尔二三知旧悄悄来凭吊一番外，守候在灵堂里的只有死者的妻子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女。不仅如此，《申报》在当日还登上了两行粗体字：“帝制余孽潦倒沪上，风流荡子魂归佛国。”使家人更加伤心。只是到了黄昏，来了一位浓眉大眼的英俊青年，这是周恩来。杨宅遗孀抓住他的手，嚎啕大哭，喊着：“你是他生前最信赖的人，你要替他说句公道话呀！”周恩来点了点头，坚定地说：“哲子先生，你放心去吧，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但是，这一承诺到周恩来临危时还在嘱托而并未实现，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杨度才真正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唐浩明先生洋洋三卷本的《旷代逸才》，详实地记述了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为什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委屈才有一说？原因就在杨度晚年虽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一生经历相当复杂。先是君主立宪的“四君子”之一，后是拥袁复辟的“筹安会”骨干，既信帝王之学，后又由庄入佛。如果客观公正地评价，杨度确是一生都在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只是一再误入歧途而已，正如他的自挽联所说：“帝道真如，而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类似这样性质的评价几乎比比皆是。比如，几位伟人为曹操翻案也是一例。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定位在“奸雄”二字上，系统辩证的重新评价首推郭沫若，他于 1959 年发表了替曹操翻案的文章，此后不少人赞同。理由是：从政治上说，他抑制权豪，禁止兼并，减租轻税，兴修屯田，安定民生，破格用人，网罗英俊；从军事上说，30 余年战争，亲自指挥大小战役 50 余次，剪灭群雄，统一北中国；从文化上说，曹操自己是个杰出的诗人，倡导和组织了“建安文学”，影响唐代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所以，认定曹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还了历史以原貌，还了曹操以公正。

其实，在此之前，鲁迅、毛泽东也有过相同的评价。鲁迅于1927年撰文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对曹操也是一直有实事求是的评价的，他曾经动情地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①

当代，有欧阳哲生先生首开《重评胡适》之说，有凌宇先生首开重评沈从文先生之举，还有唐浩明先生以洋洋三卷本，重评曾国藩一生的文治武功。后者虽还有争议，但通过这些年的评价，曾国藩不仅有罪而且也有功的结论似应站得住脚。粉碎“四人帮”后，不少人写了林彪传、康生传、江青传、蒋介石传、蒋经国传、汪精卫传，等等，主要价值也是为了力争还历史以真面目，并不满足于一顿臭批、臭骂。比如对蒋经国，过去是否定的，但通过近年来的研究，似乎至少有三点可以适度肯定：第一，早年进步，拥共反蒋。1935年曾写了一封骂父公开信；第二，不忘母恩，反对日本侵略。他在母亲毛氏被炸死后曾写过一句话：“以血洗血”，足以证明其抗日之决心；第三，逃到台湾后，仍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独。

^① 引自《中国青年文摘》1992年第1期。